论“自小说”*

赵毅衡

内容提要 “自小说”这个概念，提出已接近半个世纪，叙述学界一直没有给予比较明确的定义。在今日许多评论者的用法中，“自小说”大致上即“自传体小说”的缩略词。从叙述学角度分析作者与叙述者和人物的关系，自传体小说可以分成四个亚类：“自传小说”“仿自传小说”“类自传小说”以及严格意义上的“自小说”。严格的自小说，最大特征是第三人称隐形叙述者，但让视角人物主人公与作者同名或几乎同名。“自小说”概念已经扩展到自画像、自拍、自电影等其他视觉媒介体裁。这样一种自我描述，让作者既认同主人公，又拒绝这种认同。在情节中人物有超越作者有限经历的自由，而作者可以对作品体现的自己进行更无情的剖析，“自小说”的特殊戏剧化写作方式，是作者“让渡”自己的一部分主体性，从而给作品以特殊的张力。

关 键 词 自小说　自传体小说　隐形叙述者　同名原则

“自小说”定义模糊

自小说 autofiction 这个词，是半个世纪前(1972 年)法国作家兼文学批评家塞尔日·杜布罗夫斯基(Serge Doubrovsky，1928～2017)在他的小说封底自荐中顺便提出的，这个术语近年来成为当代文学艺术中的重要概念，文学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讨论。杜布罗夫斯基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是他的这个术语很上口，因此成为一个在文学批评界经常听见的术语。在新世纪自小说研究更加繁荣，2012 年纽约大学(NYU)召开了“当今法国的自小说”学术会议，讨论涉及的作品之广令人惊奇；2018 年迪克斯编的《迄今英语中的自小说》①列出了上百本“可以归入自小说”的英语名著，学界开始认真注重这方面的研究。

这个术语和归在这个术语之下的作品以及关于学术讨论，如今在法国大繁荣，在英美很盛行，在日本、印度等国家也是景从者甚多，印度甚至出版了一份刊物称为 Auto/Fiction，2014 年曾经被评论界称为“Autofiction 之年”。但是究竟这个术语是什么意思？Autofiction 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甚至文学史上哪些作品应当属于 Autofiction，也是众说纷纭。

Autofiction 在西语词典中、批评著作中、甚至叙述学文献中，意义不清楚，大致认为 autofiction 就是 autobiography 与 fiction 的结合。对新词比较敏感的《维基百科》的定义是“虚构化的自传”，(fictionalized autobiography)这个更加糊涂。另外的说法有“伪装成小说的自传”(autobiographies disguised as novels)，或“带有自传品格的小说”(novels with autobiographical import)，实际上意思差不多。②

就这个词的翻译而言，大部分语言用拼音翻译(包括日文)而省去辨义，而中译无法躲开意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项目号：13&ZD123)的阶段性成果。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解释,翻译法就乱成一团:“自传体小说”“虚构自传”“伪自传”(日本女作家金原瞳的小说 Autofiction 就译成这个标题)、“自小说”。应当说,这几种译法,虽然意义大不相同,但都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原术语的范围至今不清楚。

西方作者和批评家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也是很模糊。例如近年比较出色的作品,美国女作家谢拉·海蒂(Sheila Heti)的《母性》(Motherhood)、挪威作家卡尔·奥夫·克瑙斯嘎尔德(Karl Ove Knausgaard)的《我的挣扎》(My Struggle)六部曲、加拿大裔英国女作家蕾切尔·库斯克(Rachel Cusk)的《鼓童》(Kudos)都被称为 autofiction 的新成就,③前二者为第一人称叙述,后者为第三人称叙述,实际上都是典型的自传小说。这些作者也都被认为是自小说的典范作者。

“自小说”定义的多元,实际上给研究者留下了宽阔的研究余地。有的学者干脆把自己的研究标题用复数《各种自小说》(*Autofictions*)。④本文从叙述学角度分析,提出“自小说”可以包括以下多种方式:广义的“自小说”,可以理解为各种“自传体小说”的总称;狭义的“自小说”有一种特殊的结构;而多种新媒介体裁,可以属于延伸意义的“自小说”。

“自传小说”,与自传的差别

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小说”,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说出的关于自己的故事,而这故事“基本上”能与作者生平互相印证。因此,这个人格兼为叙述者-主人公-视角人物。应当说,所有的小说叙述,都是“委托代言”,都是作者委托一个叙述者“我”说出整个小说文本。因此,只要是虚构作品,作者不会与小说叙述者人格完全合一。但是作者可以与小说叙述者人格上非常接近,两个人格和经历有大量重合。哪怕小说中有不少虚构的地方情景,也都是“可以想象”在作者生平中可能会出现。这一类小说的典型之作,有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自传三部曲,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独白》,史沫德莱的《大地的女儿》,也包括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等。

有人认为郭沫若的一系列自传《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也是“自传小说”。传记与传记小说之间,边界事实上很模糊,就忠于事实而言“自传小说”甚至可以胜于“自传”。原则上说,从小说的文本里是无法断定某作品是自传小说还是自传,形式特征是不够的,需要读者或研究者走到文本之外做研究,与作者的生平结合,“知人论世”地进行讨论。

此类小说可以做到“坦陈生平”意味极强,在感情披露上可能直接而大胆,几乎接近自传。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刘绮芬(Evelyn Lau)的《离家出走:一个街头流浪儿的日记》(Runaway: Diary of a Street Kid),获得巨大的成功,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又拍成电视连续剧。这种自我坦白的意味实在太强,以至于她的续作《我与 W.P》(Me and W.P)暴露与某位著名诗人的关系,引出了诽谤官司。

那么“自传小说”的“小说”部分何在?实际上“自传小说”与纪实性的自传不同的地方,不在于虚构成分的多少(这点很难确认)。纪实作品中的想象成分,与纪录片的“摆拍”一样,实际上不可能避免。它们之间最大的分别,可能只在于叙述行文风格。

的确,虚构叙述与纪实型叙述有相当大的形式差别,这两种文体标示符号区分相当明显,因此读者区别小说与新闻,经常是自然而然的事。例如,纪实型叙述有以下形式特征:

1. 不宜用直接引语方式引用人物的话语;

2. 不宜连续用直接引语形成人物对话;

3. 不宜描述人物心情,哪怕加委婉修饰语,例如“他当时可能在想”,也不宜多;

4. 不宜采用人物视角来观察情节;

5. 不宜过于详细地提供细节,除非通过见证人的报告。

此类“不宜”,出现在任何一种纪实型叙述中,都会让读者起疑:“作者怎么会知道的?”从而破坏文字的“纪实品质”。作者为了让读者信服写的是传记,而不是小说,会在文体上回避这些特征,从而形成一种容易辨认的“纪实风格”。但是,是否直接引语占引语百分比多少,就是虚构?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正因为文本风格标准如此不可靠，很多论者认为用风格学区分虚构与纪实，是不可能的任务。⑤热奈特认为哪怕能区别，也只能靠风格统计区分二者。⑥但是谁也提不出一个统计标准。如果真的有标准，也只能说“大致上如此”。由此我们只能说“自传小说”与纪实性的自传，在形态上的区分是很困难的。

在文学研究的实践中，这二者经常会混淆：汤婷婷的《女斗士》(Women Warriors)在大学英文系被称为是小说，因为适合写女性主义的论文；在书店里却放在“非虚构”书架，比较好卖。反过来，海蒂的《母性》一书，评者说“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出版商称之为‘小说’”⑦，因为在风格上与纪实自传很相似。应当承认，这两者经常很难分清。库切的《少年时代：外省生活情境》(Boyhood: 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青春》(Youth)，和《夏日》(Summertime)在中国出版时称作“回忆录”，西方批评家认为是“自传小说”。作者本人却一开始就声明“本书任何部分切勿对号入座”。有些作者自己态度也是游移不定，或故意躲闪。缪塞在《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一开始就说“写自己的生活史，首先需要经历过才行，所以我现在写的不是我的生活史”。过了不久又说“我年轻的时候便染上了一种讨厌的精神上的病患，所以我把自己三年中所遭遇的事情叙述出来”。

仿自传小说(pseudo－autobiographical novel)

这一类小说，与“自传小说”不同，几乎不可能指证情节中与作者生平经验相合之处，可以肯定小说的叙述者，是作者的直接代言人，既然叙述者—主人公—视角人物是同一个人物“我”，他与作者的联系应当非常密切。但是根据研究者考证作者生平，却很难确定与作品内容可以两相印证。

小说中主人公的自称，有时候可以变化，例如高行健的《灵山》，此小说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交错使用，主人公自称，用的是第二人称“你”，这是把“我”变身为叙述接收者，以降低认同程度。

这一类小说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逝水年华》。整部小说的绝大部分，是“我”的种种感受、生活经验。对这本经典之作，研究已经很多，许多学者讨论了这本小说的自传因素。但是研究者至今能提供的，关于普鲁斯特的生平，尤其是他的交友圈，能与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互相印证的，只是一些难以确定的猜测。

但是贯穿全书的“我”，不应当无缘无故用作者名字“马塞尔”。由于小说是用语言写成的，其形象并不具有视觉上的透明度，此时人物的名字，成了与作者身份对证的重要标记。杜布罗夫斯基本人已经指出这个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同名原则”(principle of homonymity)。同名或第一人称，都不是判断作者在何种程度上与人物合一的标准，却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在讨论狭义的自小说时，这将是一条有决定意义的标准。

这一类小说相当多，例如让·雷内(Jean Rene)的《小偷日记》、莱辛的《金色笔记》、太宰治《人间失格》，而高玉宝直接把书名叫做《高玉宝》。屈原的《离骚》实际上也属于这一类，此首长诗中的叙述者—主人公自称“余”，全诗开始就点出自己的名字：“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很多学者认为“正则”“灵均”解释屈原的名平，字原。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高平曰原，故名平而字原也。正则、灵均各释其义，以为美称耳。”王夫之在《楚辞通论》也认为：“平者，正之则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隐其名而取其义，以属辞赋体然也。”《离骚》不是自传，诗的大部分是“余”的幻想神游，而政坛起伏，国运感慨，生世悲吟，只占了比较小的一部分，因此只能算韵体的“仿自传叙述”。称为“仿”的原因，是因为主人公故意借作者名字，叙述的其他部分与作者生平无法相互印证。

类自传小说(para－autobiographical novel)

第三种经常归入到“自小说”名下的，可称为“类自传小说”，实际上这是所谓自传小说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它们不像第一类“自传小说”，其视角人物－主人公与作者生平重合之处可多可少。不像“仿自传小说”，叙述者兼主人公，这类小说让主人公兼视角人物，以增强他的主体精神。这位核心人物与作者不同名，只是文学史家感觉到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这位视角人物－主人公与作者的出生、经历，尤其精神气质很类似。

其实大部分我们称作“自传小说”的经典作品，都属于此类。例如元稹的《莺莺传》，刘鹗的《老残游记》，郁达夫的《沉沦》，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老舍《正红旗下》，琼瑶的《窗外》。再例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肖像》，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德莱塞的《天才》，伍尔夫的《奥兰多》《到灯塔去》《达洛维夫人》，毛姆的《人性的枷锁》，凯如阿克的《在路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莱辛的《金色笔记》，汤婷婷的《女战士》。

这个单子可以无穷无尽地开下去，本文点明大部分的自传小说是第三人称“类自传小说”，或许有点让人惊奇，实际上完全可以理解。大部分自传小说的作者并没有意愿写一部暴露一生细节的自传，他们的主体经验虽然占主导地位，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生平经验写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都是一部“类自传小说”，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找到贾宝玉与曹雪芹精神相通，经验与共，无怪乎端木蕻良凭他对《红楼梦》的研读理解，写成长篇小说《曹雪芹》，从作品人物反写作者生平，这是很少见的例子。

为什么这类小说特别多，尤其是可以问：为什么中国作家喜欢这种“类自传小说”？相当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并不欣赏过于张扬自我。另一方面又很注重“诗言志”，喜欢把自己的实际经验写入作品，二者结合，就使这种“类自传小说”长期得到青睐。

此类小说有个变体好例，是日本“残酷青春小说”代表作家金原瞳（Hitomi Kanehara），她的成名作题目就叫《Autofiction》（中文翻译成《伪自传》）。小说的分层结构，是一个第三人称超叙述层次，一个名叫 Rin 的女作家，写了第一人称自传式回忆。所以贯穿的主人公，就是 Rin 本人。这实际上是一部结构复杂的“借名自小说”，虽然借的不是作者名字，其内部借用超叙述者（也就是在文本世界内仿“作者”）的自小说。所以这部小说，结构上属于上面说的第三人称“类自传小说”上加第一人称“仿自传小说”分叙述层次。无愧于这部小说的标题，此书几乎是自传小说各种变体的寓言，却偏偏没有下一节说的严格意义的“自小说”。

自小说，狭义的

狭义的“Autofiction”，也就是本文的主旨“自小说”，与以上三类自传小说很不同的地方，在于整部小说，或其主导部分，使用第三人称。小说让一个隐形的叙述框架负责叙述，这样的框架叙述者人格不显，当然不需要名字。但是作者却偏偏让人物用自己的名字，这样就在一个貌似比较客观的隐形叙述者框架里，出现一个看起来与作者身份重合的人格：作者与主人公合一，但同时否认此合一，因为他把叙述权让给第三人称叙述者，就不是他自己在讲这段故事。这样的自传小说，是作者自我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想象变体：在情节上可让人物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去经历作者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同时“比较客观地”、严厉地剖析主人公的精神世界，由此给小说的主体精神一种特有的张力：小说在说“他”，实际上说的“我”，因为这个“他”比一般小说中的“我”更靠近作者。作者带着一个面具，却是非常像似作者面容的面具。

这样的小说不容易写，可以举几个例子：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L’Armant de la Chine du Nord）用的是第三人称，与在其先，并且说的几乎是同一个故事的《情人》（L’Armant）几乎全本书用第一人称不同。主人公名字是玛格丽特，其中的“她”明显是指的《情人》中的“我”，两本书写法不同，但是主人公都有杜拉斯早年在越南的恋爱经历，也有困扰她一生的忧郁症。因此，《情人》是“自传小说”，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是“自小说”。

属于狭义“自小说”的第一名著，应当是卡夫卡的《城堡》和《审判》，它们都是隐形第三人称叙述，但是主人公名字称为“K”，明显是卡夫卡名字的缩写。加上卡夫卡与“K”的精神气质、忧郁心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态十分相似，它们作为小人物四处碰壁郁郁寡欢的生平，也很相似，无怪乎这两部小说改编成的电影，选的演员非常像卡夫卡本人。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作家本杰明·伦纳(Benjiamin S Lerner)的小说《十点零四分》(10:04)，主人公是个住在纽约的33岁青年作家，却被诊断出患有绝症，他的名字叫Ben，本杰明的简称。写此书时他的确是33岁。所以这是典型的“自小说”结构。

自小说这个词来自法国，至今也是法国作家最醉心于自小说写作。经常被人引用的一部“自小说”是卡特里娜·米莱(Catherine Millet)的小说《卡特里娜·M.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Catherine M)，此书的英译本引发了争议，被称为“女人写的最露骨的情色小说”。被如此称呼，不仅是因为其内容，更是因为主人公几乎完全袭用了作者的名字，颇有自我夸耀的色彩。

如此划分，应当说还算比较清楚，但是依然会面对许多争议。如果我们把“合用名字”作为自小说的标准，上文说的第一人称叙述的“自传小说”与“仿自传小说”，其叙述者－主人公也可能借用作者的名字，有些批评家(例如Philippe Vilain)认为这也是一种“自小说”，即“第一人称自小说”，[8]有人称之为“普鲁斯特型自小说”(Prustian Autofiction)。只是小说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这个借自作者的名字，只有在引用别的人物称呼“我”的时候，才会出现，不用于自称(因为主人公自称“我”)，因此这种名字合一不是很明显。第一人称“仿自传小说”作者主体已经如此坦陈，实际上与作者同名的情况已经不太引人注意。不像第三人称小说的主人公借用作者名字，引起阅读心理上一个突如其来的压力。学界有些论者强调“第三人称同名自小说”应当独成一类，从叙述特征上来说，是有道理的。[9]

自小说近年的繁荣，可以明显看出来自两个源头，一是女性文学的兴起，女作家自我呈现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欲望，看来比较强烈，这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需要写出自我，写出从女性角度，而不是一般化的“人的”角度(实际上是“男性角度”)讨论这个世界这个人生。可以说，女作家的自小说作品推动了这个体裁的兴起。

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互联网兴起之后出现的“自行出版”(self－publishing)潮流，互联网大潮在中国特别明显，中国的网民已达7.7亿之多。网上阅读的规模，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自行出版”潮流应和了杜布罗夫斯基半个世纪前提出“自小说”一词时的预言，当时他指出：传记是给“世界上的重要人物”写的，树碑立传的，而Autofiction是任何人都可以动手写的，是作家从生平取材，为读者而写作，“传记留给大人物，自小说留给每个人”。

互联网真正实行了“自行出版”，中国网上，有几部自小说创造了文学影响的奇迹。[10]一部是唐家三少的《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其中的主人公名为长弓与木子，这明显是他们夫妻张威与李默的姓。小说写了这两个人长达17年的爱情。李默当时已经患有乳腺癌，不久去世，这真实经历为这部自小说增添了感人肺腑的真实色彩。郭羽与刘波的《网络英雄传》也是网络自小说的佳例。小说主人公与他们一样，年轻时是杭州大学的校园诗人，此后在网络场上摸爬滚打20年，苦心经营网络商业。小说主人公名字叫郭天宇和刘帅，明显是他们名字的转写。

或许“自小说”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王小波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和其他小说。这些小说主人公名字叫“王二”，明显指王小波自己。在某些部分，叙述者又自称“我”，这样就成了第二类“仿自传小说”。如此一来作者就获得了情节上巨大的自由度，王二经历的情节完全超出作者王小波的经验范围，但是小说对王二的犀利剖析、嘲弄讥讽，却又是作品魅力的重要部分。应当说，王小波的作品有一部分具有自小说色彩。自小说显然不只是一个叙述形式问题，而需要文本之外的研究，来确定作者与主人公的经历究竟有多少重合。

叙述学分析

对这些作品的叙述学分析，做的比较仔细的是热奈特(Gerard Genette)，他在1990年在《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上发表名文《虚构叙述，纪实叙述》(Fictional Narrative, Factual Narrative)[11]，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下面的图示改自热奈特提出的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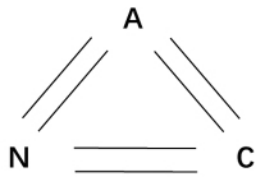

图1　自传,作者即叙述者,即主人公

而第一人称自传小说的构造就比较复杂,下图中的等线,是无法在文本中得到确定的,需要研究者研究作者生平之外因素,才能得到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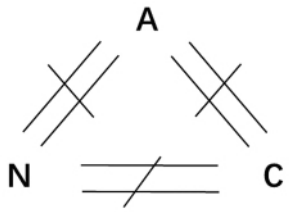

图2　第三人称小说,作者非叙述者,非主人公

但是自小说 autofiction 的格局很特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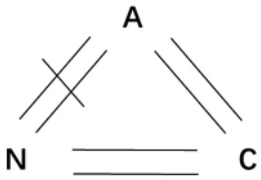

图3　自小说,作者非叙述者,却即主人公

其中第一张图作者 = 叙述者 = 主人公,第一个等号表示纪实叙述,第二个等号表示自传; 而第二张图,作者不等于叙述者,因为是第三人称叙述; 而作者等于主人公,说明是自传,只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自传,可见热奈特用 Autofiction 此词,指的是我们上面说的第四类,即狭义的"自小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张表:

广义自小说	自传小说	仿自传小说	类自传小说	狭义自小说
典型作品	托尔斯泰自传	追忆逝水年华	大卫·科波菲尔	城堡
叙述者	显身	显身	隐身	隐身
主人公与作者名字	同名	变相同名	不同名	同名或变相同名
主人公与作者联系	大致合一	可以大致合一	可以大致合一	可以大致合一

视觉媒介"自小说"

上面已经提到过了,名字并不是作者可以借给主人公的唯一因素,实际上名字只是在第三人称自传小说中最明显,最容易与作者产生"合一感觉"的因素,其他因素,包括杜布罗夫斯基自己提出的主人公可以与作者共享"年龄,职业,社会文化地位,向往等"⑫。因此,凡是自小说作品改编成电影,导演会尽可能找与作者(在小说所描述的时代)的照片相仿的演员。我们可以在卡夫卡《审判》与《城堡》的电影中看到与卡夫卡脸容非常相似的演员; 在杜拉斯《情人》与《中国北方的情人》电影中出演的简·马奇(Jane March)则尽量朝杜拉斯年轻时候的照片化妆。主人公借了容颜,改编的影片就比原小说更具有"自小说"的色彩。

因此,不奇怪,在当代文化视觉转向之后,自小说大规模地溢向其他体裁,例如连环漫画(comics),照相"自拍"(selfie),视频"自拍"(self - video)以及各种"自拍电影"等新媒介叙述体裁。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视觉自我表现,与文字的"自小说"一样,需要借用作者人格。文本表面上维持着自然文本的特色,与一般肖像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相当于文字作品中的虚构,可以做大量的加工、剪辑、PS 等。

连环漫画与电影《在无双塔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No Towers),作者阿特·斯皮尔曼(Art Spielman)描写了自己在"9·11"中的经历: 9·11事件爆发时,阿特的家就住在事发现场附近,而他女儿的幼儿园就在事发地现场,那个区域在后来被称为"归零地(Ground Zero)"。在9·11袭击发生后,他立即与妻子一起去在恐怖之地寻找女儿,这一路充满了惊险、恐惧、慌乱与焦虑。当时斯皮尔曼是《纽约客》的美术编辑,后来他把自己的经历创作成漫画连环画。这种自传被称为"图像自传"(graphic autobiography),而其中的主人公就叫"阿特"。最后这套漫画被拍成电影,斯皮格尔曼编剧,画外音讲述,用画面、漫画、各种音乐构成。

法国女导演弗朗索瓦丝·罗曼(Francoise Romand)导演的电影《摄影机我: 自小说》(The Camera I: Autofiction)是一部奇异的电影: 主人公是一个女导演佛罗伦丝·罗曼(Florence Romand)为了推出她的实验电影,走过了全世界许多城市,也有不少艳遇,而演出此人物的是她自己。这样作者就与叙述者(电影制作班子)合一,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也与主人公合一。

所有的自小说，都是作者出借他的一部分主体性给主人公，这样制造一种“印象同一”。但是出借的究竟是什么，这取决于媒介。诚然，一张肖像照片，与一张自拍照片，在符号文本的意义上，看起来是一样的。甚至它们的扭曲变异状态也是雷同的：肖像可以美化，自拍也可以“美颜”。

这些小说的“自传性”完全要靠研究者对作者生平的研究与了解，不然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部写某个人物命运的第三人称小说。“自拍”照片也一样：只有当我们走到文本之后，看其形成过程，这时才能从“自拍”照看出许多层附加的意义：发出者的直接“借用”自己的形象给文本，是文本携带着一系列肖像之外的意义：自我炫耀，自我揭示，自我怜悯，发出者不仅是意愿上，而且是主动采取一定的表意方式，让文本卷入了自我对于自我的各种微妙的意义姿态。

自小说潮流的文化史意义

自小说是用各种方式，让自我有所显露、变形、加强，让自我与人物在某种方法上合一，在想象中参与历险。严格意义上的“自小说”，在借出人格上添了一个新方法，即让渡名字，或在视觉艺术中让渡形象。这个“让渡人格”，起到关键性的重大效果，尤其影响到文本的解读。在各种“自小说”中，作者的自我呈现既是分裂的，又是合一的，有点像半边面具，人物与作者时分时合，造成自我迷人的自我戏剧化。而在狭义的“自小说”中，作者在文本中带上的面具，很像他本人，这就使自我戏剧化具有了特殊的张力。

研究自传小说，使我们走出文本，从叙述者与主人公的人格，走向作者的人格。固然，所有的作家，所有的小说，都必然多多少少使用作者的主体经验和生活感受，但是他们只是在做“比喻性的借用”。各种“自传小说”的作者不仅是借用，而是依赖；不仅是当作助力的经验，而且是把自己的经验自我，当作主体存在的方式。这就使它们与一般的小说很不相同。

可以看到，第一类，即绝对的“自传小说”几乎是作者生平和心灵的记述，可与卢梭的《忏悔录》比美的自我解剖。而最后一类狭义的“自小说”，几乎追上了这样一种自我坦白，只不过拜托了“我”的自我中心，用第三人称叙述，可以更保持一定审视距离，解剖自我。所以这种狭义的“自小说”，绝大部分主人公的名字，与作者（导演）总是有一点差别，不至于作品被认为是完全严格意义上的自传，那样就成了纪实叙述，而不再是小说。为了保持文本的虚构作品地位，主人公与作者必须避开完全同一。

不过有不少批评家认为，近年兴起了自传小说的浪潮，各种变体层出不穷，说明了思想界更加重大的变化。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与解构主义，已经将主体精神“幻觉”批驳的体无完肤，对卢梭的《忏悔录》这部“自我坦诚”的源头作品，德里达给予无情解剖，指出其中的主体性只是一种自我构造的神话。文学创作也走向了后现代实验小说高度的“非个性化”。然而，随着自小说浪潮卷上海岸，主体性又成为文学理论界注视的中心，替代了后现代实验主义过分的非人格化。[13]作者的精神世界，也成为读者热衷分享的对象。

这证明了主体性已经顶住后现代拆解的压力，终于又回到了社会文化注意力的中心地位。这个潮流让我很受鼓舞，因为至少我们在证明，文学艺术依然是人性的，高度人性的。这个“自小说”趋势，与传播界的“后真相”命题相一致[14]，值得批评界予以严重关注。正当叙述学界依然在热闹地讨论后现代小说“非自然叙述”，现在可能要转换视线。又一次理论落后于实践，这或许是我们研究者被诅咒的命运。

---

①Hywel Dix (ed), *Autofiction in Englis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②Philippe Gasparini, *Autofiction: Une Adventure du langage*, Paris: Seuil, 2008.

③Rebecca van Laer, “How to Read Autofiction”, http://blog.pshares.org/index.php/how-we-read-autofiction.

④Claude Burgelin et al (eds), *Autofiction(s)*, Lyon: PULL, 2010.

⑤方小莉《叙述与叙述演变：兼评保罗·科布利〈叙述〉》，《符号与传媒》2018年第17辑，第259页。

⑥“More precise comparisons would only be a statistical matter”, Gerard Genette, “Fictional Narrative, Factual Narrative”, *Poet-*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ics Today, Vol 11, No. 4, p. 758.
⑦Emily M Keeler, Antofiction Grows Up: A Little, 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 http://reviewcanada.ca/magazine/2018/07/autofiction-grows-up-a-little.
⑧Philippe Vilain and Jeanine Herman, "Autofiction", In (ed) Villa Gillet, *The Novelist's Lexicon: Writers on the Words That Define Their W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5~7.
⑨Lorna Martens, "Autofiction in the Third Person, with a Reading of Christine Brooke-Rose Remake", in Claude Burgelin et al (eds) Autofiction(s), Lyon: PULL, 2010, pp. 49~87.
⑩王小英《广义叙述学视野中真人秀的"间类"符号特征》,《符号与传媒》2017年第14辑,第110页。
⑪Gerard Genette, "Fictional Narrative, Factual Narrative", *Poetics Today*, Vol 11, No. 4, p. 755.
⑫Philippe Gasparini, *Autofiction, Une advanture du langage*, Paris: Seuil, 2008, p. 25.
⑬Jonathon Sturgeon, "2014: The Death of the Postmodern Novel and the Rise of Autofiction", *Flavorwire*, December 31, 2014.
⑭Majorie Worthington, "Fiction in the 'Post-Truth'", Era: The Ironic Effects of Autofiction, *Critique: Studies in the Contemporary Fiction*, Vol. 58, 2017, Issue 5.

作者简介:赵毅衡,1943年生,重庆三峡学院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刘　蔚〕

"寿良郡"新证——兼正《汉书》标点一则

杜　晓

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又诏'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寿良、卒正王闳、扬州牧李圣亟进所部州郡兵凡三十万众,迫措青、徐盗贼……'"(第4181页)其中"寿良"上断,以之为兖州牧之名,而"卒正王闳"则不明是何郡卒正。然清人早对此句有不同理解。《汉书·地理志》"东郡"下有"寿良"县,因之钱大昕将"寿良"下断,并以"寿良卒正"证新莽改寿良县为郡,然对新莽时寿良县是否改置为郡,"寿良"是否可以下断为"寿良卒正",并未涉及。此说为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卷一〇,《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04页)、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4页)、谭其骧(《新莽职方考》,《长水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所沿袭。

近年西安卢家口村汉未央宫前殿遗址附近所出新莽封泥中有"寿良平桓卒正""寿良属令章"(马骥《新出新莽封泥选》,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2016年版,第27页,"寿良属令章"图片在第108页),可证新莽时"寿良"确从原郡划出,另立为郡。《汉书》卷九九《王莽传》载天凤元年,"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世其官"(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36页)。可知"卒正"为新莽郡级长官,相当于西汉太守,由封为伯者担任;"属令"相当于西汉郡尉,由封为子者担任。"寿良平桓卒正","平桓"无考,但新莽"卒正""连率"往往前冠以"郡名+县名"(王国维:《记新莽四虎符》,《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8~909页),因而"平桓"应为县名,印主的身份为寿良郡之卒正。"寿良属令章"则属于寿良郡的属令。由此二枚封泥可知,新莽确曾将西汉东郡下的寿良县划出置郡,因而上述《王莽传》记载中"寿良"应下断为"寿良卒正王闳"。

《后汉书》卷一二《张步传》:"及王莽篡位,僭忌闳,乃出为东郡太守。"(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00页)王莽即真后,始建国元年即改郡太守为大尹,而东郡亦曾改名"治亭"。此处"东郡太守",显是依汉制述新莽史。寿良西汉属东郡,"东郡太守"亦可证王闳曾为"寿良卒正"。

照此断句方式,则"兖州牧"后缺少姓名,这可能是由于《汉书》在传抄过程中兖州牧之名脱漏。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汉书》卷九三《佞幸传》:"而王闳王莽时为牧守,所居见纪,莽败乃去官。"(第3741页)可知王闳在新莽时曾担任过州牧与郡守。其中郡守应是指其任寿良卒正,而州牧可能即指曾任兖州牧。其任寿良卒正与兖州牧,或为同时兼任,或为先后担任,而《汉书》载为"兖州牧、寿良卒正王闳"。

要之,新莽之时"寿良"确从原郡划出,另立为郡。中华点校本《汉书·王莽传》"兖州牧寿良、卒正王闳"中"寿良"应下断为"寿良卒正王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only focus on Liang's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and exte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but also rediscover the significance of Liang's cultural theory and life view.

(6)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 under Condition of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Zhang Kangzhi* · 138 ·

The significance of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 for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is self-evid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 and method in management is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Nonetheless,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 is established on the premise of organization-egotism, requiring stability of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ccordingly.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post-industrialization, the departmentalism is in a state of dissolving for high-complexity and high-uncertainty of the society; the foundation and condi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 is disappearing. Meanwhile, the managerial institution and method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 loses its reasonability. The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pursuing its objective with all the actions, will be replaced by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n principle, there is no clear and definite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 i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t operates directly according to the undertaken task which may come out as a form of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 but only a temporary objective and which will get adjusted with the change of task and with the volatility of organizational objective.

(7) **System Interpretation of Procedural Defects in Shareholders' Meeting Resolutions** *Peng Zhenming Wen Changqing* · 147 ·

The key to choose the interpretation method of procedural defect of shareholders' meeting is to fit the essence of the problem of proper law of resolution procedure, and the aim should be to identify and confirm the content of intention expression. In terms of interpretation, th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jumping stages: notice call stage, attendance and presiding stage and voting stage. The defects of the notice call stage are mainly the defects of the convening power and the way of notification. The defects of the attendance and presiding stage are revolved around the defects of the numbers of attendance and the manners of attendance, the defects of the presiding power, and the defects of the unfree discussion of the meeting. At the voting stage, the defects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deficiency of the proportion of voting rights adopted, the new temporary motions in the meeting and the forged signature of the resolution document. The interpretation of procedural defects should grasp the substantive value objectives of specific procedural elements and interest balancing method, to interpre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esolution validity caused by procedural defects, and construct a set of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procedural defect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 resolutions.

(8) **Study on Legislation Pattern of Core Values into Law** *Jin Meng* · 155 ·

The core values are the great virtue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tegrating core values into law concerns the correct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w and morality. As the important part of morality, core values play a guiding and driving role in the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and its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y are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Integrating core values into legal system is the general practice in many countries during building the country by the rule of law. We will guide the legislative work with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 order to allow legislation to play a guiding and driving role continuously, we will not only convert the content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to legal language and write them in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clause, but also convert the main content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to legal principles and rules. Only in this way can core socialist values play a leading role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legislative level and legislative quality of our country.

(9) **Essence of Honil Kangri Yeokdae Gukdo Jido and Purpose of Its Mapmaking** *Yang Yulei* · 172 ·

Honil Kangri Yeokdae Gukdo Jido, the earliest existing Korean single world map was made in 1402. As the earliest single world map existed in East Asia, it synthesized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China, Islamic world and Korea. Being characteristics of reading history map, Honil Kangri Yeokdae Gukdo Jido presented the world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Yuan Dynasty of China, while some of the content came from Korean knowledge. It inherited the concept of Hunyi (unification) of Yuan, showed the great unification scene in early Ming Dynast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mal tributary relations between Ming and Korea, Korea specially drew Honil Kangri Yeokdae Gukdo Jido so as to express its identification to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order centered on Ming as well as to emphasize its important status.

(10) **On Auto-Fiction** *Zhao Yiheng* · 211 ·

Half a century ago, the term auto-fiction was first put forward, but there was not clearly defined for it. In the writing of most critics today, however, it is a portmanteau word of "fictionalized autobiography". In narratology, fictionalized autobiography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subgroup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pseudo-autobiographical novel, para-autobiographical novel, and auto-fiction in the strict sense. The most salient feature of auto-fiction then is that it employs an implicit "third-person" narrator, but the focal-character-protagonist bears the name (or part of it) of the author. Similar self-reflective representation could be found in visual media such as self-portrait, selfie, self-video and others. Such an auto-fictional work could allow the author to identify and deny as well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rotagonist. The characters in the fiction could have more freedom in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refore offer a more acute anatomy of the author's mentality.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